



从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看宋朝的重文抑武*

史冷歌

摘要: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防范武将,加强对武将的控制,不断贬抑武将的地位,这种举措也为他以后的皇帝所继承。在宋朝崇文抑武、以文抑武的政策下,宋初“握兵之重”的三衙管军,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自宋太祖至真宗时,逐步废除两司、三衙的最高军职;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等管军或多或少变为虚衔;管军武阶逐步降低,由宋初的节度使降为防御使、刺史,且三衙管军人员频繁更换;低级管军中的管勾(主管)三衙公事,在宋真宗时逐渐成为最高军职,至南宋建炎时便正式成为管军的正常差遣,并成为南宋主流的差遣名目。三衙管军地位下降的定局,都是宋朝官场文尊武卑的表现。

关键词:宋朝;三衙管军;地位下降;重文抑武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3-0058-09

北宋初建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为三衙,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即九员管军。宋朝皇帝为巩固皇权,实行崇文抑武、以文抑武的政策,不断贬抑包括三衙管军在内武将的政治地位,以便加强对武将的控制。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第一章第二节《三衙》中,对北宋朝的三衙以及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进行了论述;其他学者也有相关论述^①。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三衙管军军职、官位与管军员数的变化,低级管军逐渐成为最高军职等方面,对宋朝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情况进行考察。

一、北宋前期两司三衙管军或多或少变为虚衔

五代时的两司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殿

前司最高军职为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司的最高军职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候,皆为有统兵之权的实权派军职。北宋太祖即位后,沿袭五代两司之制,并且立即对有“翼戴之勋”的众人封官晋爵与大力赏赐:“石守信自义成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自宁江节度使、马步军都指挥使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厌次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安喜、赵彦徽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官爵阶勋并从超等。”^[1]卷1,建隆元年正月己未、辛亥,6-7为安抚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将慕容延钊由后周的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升为殿前都点检、昭

收稿日期:2021-01-15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宋代武官研究》(JDBGH16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冷歌,女,历史学博士,铜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贵州铜仁 554300),河北大学岳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宋史研究。

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韩令坤由镇安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1]卷1，建隆元年正月己未、辛亥，7。两人成为两司的最高军职。

北宋建立伊始，三衙管军为握有兵权的实职。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叛，宋太祖遣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帅前军进讨”，五月，殿前都点检、昭华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合。石守信等“破筠众于长平，斩首三千余级，又攻拔其大会寨”^[1]卷1，建隆元年四月丙戌、庚子、癸卯，13-15。宋太祖部署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兵屯河阳，自己亲自督战石守信、高怀德等攻打李筠^[1]卷1，建隆元年五月丁巳、丁卯，六月己巳朔，16-17。九月，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叛，宋太祖令命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扬州行营副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保信节度使宋延渥为排阵使，“率禁军讨之”^[1]卷1，建隆元年九月己未，25。在讨伐李筠与李重进的军事行动中，石守信等人皆为掌有兵权的实职。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在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等武将的支持下，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宋太祖对开国功臣的大肆封赏，是当时的形势所需，实则内心中对经历过“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2]卷282，天福四年七月庚子朔，9203，以及对五代时期的功臣们“各典禁卫”^[1]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49，心中是非常猜忌和防范的，以至于出现恐惧症的相关症状^[3]。为防范类似于陈桥兵变之类事件发生，在用武将为其效命的同时，防范武将，削夺武人的兵权是必然之举。重文抑武，也为他以后的皇帝所继承。

建隆二年（961年），在“杯酒释兵权”前，宋太祖就先“释”了殿前都点检的“兵权”。闰三月时，宋太祖将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军节度使，“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1]卷2，建隆二年闰三月甲子朔，42。七月，“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

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1]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50。“凡诸将职典禁卫者例罢，悉除节度使”^[4]续集卷1《殿前三司军职》，9册，168，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一年后，石守信自请免去侍卫都指挥使之职，宋太祖“许之，特加爵邑”^[1]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50；卷3，建隆三年九月戊午，71。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军职依然在掌军。乾德二年（964年）四月，宋太祖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领兵赴潞州，备北汉也”^[1]卷5，乾德二年四月丁卯，126。十一月，宋太祖命令王全斌等“分路进讨”后蜀时，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西川行营凤州路副都部署，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指挥作战^[1]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十二月辛酉、辛未，134-139。开宝二年（969年）八月，宋太祖命昭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勋征讨北汉时，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行营前军副都部署。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征讨北汉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军作战^[1]卷9，开宝二年八月戊辰，207；卷17，开宝九年八月丁未，374。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宋太宗以振武节度使、殿前都虞候白进超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白进超“初无灼然战功，徒以小心谨密抚士卒，故致将帅焉”^[1]卷19，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朔，432。宋太宗选没有“灼然战功”的白进超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在于此类人较宋太祖时战功赫赫的武将更易于驾驭。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攻打北汉太原时，侍卫马军都虞候米信、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充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1]卷20，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庚寅，443，和宋太祖时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出征相比，宋太宗遣低等的管军、都虞候出征，更易于驾驭。米信在宋太宗即位后不断提拔，算得上是宋太宗的亲信，所以在太平兴国四年二三月时升至马军最高的军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5]卷26《侍卫马军司》，1763；^[6]卷260《米信传》，9022-9023。两年半后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即以米信为定州都部署^[1]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甲申，503。米信的差遣为定州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之职，只为他提供了相应的俸禄和待遇，而没有实际的掌军之权。再如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宋

神宗“诏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太原府路副都总管刘永年赴阙供职,(管勾)步军都指挥使兼(管勾)马军司”^[1]卷315,元丰四年八月丁卯,7627。宋神宗令刘永年“(管勾)步军都指挥使兼(管勾)马军司”时,才能“赴阙供职”,就是说此前刘永年的太原府路副都总管为实职,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只是虚衔。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并、代都部署、步军都指挥使高琼,钤辖东上阁门使李允正率所部至行在,即诏琼领兵屯冀州”^[1]卷46,咸平三年正月己卯朔,983。高琼的官衔中,第一是并、代都部署之差遣,管军之职则在第二位,表明管军已经是虚衔。宋真宗命高琼“领兵屯冀州”,再次证明了其管军并非实职。四月,殿前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范廷召“自定州来朝”;五月,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节度使王汉忠“自涇原来朝”;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并、代州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彭信“来朝”;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高阳关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来朝”;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马军都指挥使王守赉外任”^[1]卷47,咸平三年四月癸丑、五月壬辰,1010、1016;卷49,咸平四年三月甲申,1053;卷51,咸平五年二月丁亥,1116;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壬辰,2199。这些例子,都证明之前“掌殿前司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及训练之政令”^[7]职官32之1,3813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等成虚衔。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宋真宗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感德节度使葛霸为澶州修河都部署。^[1]卷57,景德元年八月丙寅,1261侍卫马军司名义上的最高军职担任非军事差遣,也从侧面表明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殿前司“人吏无定,只本司增移补置”,十一月时,宋真宗下诏规定:“殿前司、侍卫司,自今孔目官以下有阙,不得擅自转补及改名,并奏听朝旨。”^[7]职官32之2,3813宋真宗将都指挥使的奏补之权收归中央,或者说皇帝之手。此后,又将殿前、侍卫司“非时宣取兵士”之权剥夺^[7]职官32之2,3814。

二、三衙管军的武阶官位下降

三衙九员管军作为北宋最高军职,自然须有相应的武阶。在宋太祖时,其一般的武阶都是节度使。但较低的军职,如:殿前都虞候张琼

为嘉州防御使^[1]卷4,乾德元年八月壬午,101;[6]卷259《张琼传》,9009;殿前都虞候杨信为汉州防御使^[6]卷260《杨信传》,9016;外戚权侍卫步军司公事王继勋为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1]卷7,乾德四年五月庚寅,172;[6]卷463《王继勋传》,13542;刘遇为侍卫步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6]卷260《刘遇传》,9021;外戚杜审琼以左金吾卫大将军权点检侍卫步军司公事^[1]卷7,乾德四年九月丙辰,179;[6]卷463《杜审琼传》,13536。这看来似为当时的特例。

景德年间对辽议和后,刘谦“前以马军都虞候、涿州防御使,权令殿前都虞候”,“至是擢谦为殿前副都指挥使”,“领振武节度”。张耆“擢拜侍卫马军都虞候、英州防御使”^[1]卷61,景德二年十二月癸未,1377。当时三衙都虞候可由防御使担任,已成常例。

《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三衙“以节度使为都指挥使,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无定员,以刺史以上充”^[7]职官32之3,3814;[8]卷35《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658。与宋初相比,相应武阶的下降十分明显。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侍卫步军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广升卫州防御使、侍卫马军都虞候^[1]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7830。

宋哲宗时,“殿前都虞候、雄州团练使、权发遣涇原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刘昌祚为冀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虞候、宁州团练使、权发遣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刘舜卿为殿前都虞候,忠州防御使、太原府路副都总管李浩为马军都虞候,并差遣依旧”。而另一“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威州团练使、兼权马、步军司姚麟为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1]卷412,元祐六年六月丙辰,10027。这表明前三人的三衙管军都是虚衔,而实职差遣仍是一路的统兵官。其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相应武阶降至观察使,而另两位都虞候的相应武阶可降为防御使或团练使。至于姚麟,则此前以“威州团练使、兼权马、步军司”。

宋徽宗政和时,虽然强调“管军为武臣极任”,规定三衙管军的相应武阶,实际上执行并不严格。如按规定“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然而曹曠在“宣和年”,任“殿前都虞候、忠州团练使”,又改差“权(管勾)侍卫马军司公事”。至北宋末靖康时,竟降为由遥郡“中卫大夫、果州团练使”李邀出任“权(管勾)侍卫马军司公事”^[7]职官32之7,3816;[5]

卷26《侍卫马军司》，1766。

南宋建立后，殿前都指挥使“间虚不除，则以主管殿前司一员任其事”。淳熙以后，“殿前司有权管干，有时暂管之号”，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则置主管侍卫马军司、主管侍卫步军司各一员^[6]卷166《职官志》，3929-3931。此表明三衙管军已不再是全国禁军和厢军的最高统兵官，只是三支屯驻大兵的统兵官，其相应武阶就降至更低。乾道元年(1165年)，遥郡“左武大夫、忠州刺史、马司选锋军统制”李舜举“除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7。淳熙七年(1180年)，“武翼大夫、右骁卫将军”雷世贤“除(侍卫)马军司都虞候”^[5]卷26《侍卫马军司》，1767，官位比李舜举

更低。淳熙十年(1183年)，翟安道“特转修武郎(正八品使臣)，除(侍卫)步军都虞候”^[9]卷146《奏翟安道步帅指挥》(淳熙十年)正月十四日，50册255。宋宁宗开禧时，从七品诸司副使的武德郎戚拱“主管(侍卫)马军司职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8。嘉定十年(1217年)，正八品使臣训武郎李庆宗“除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8。南宋后期，孟珙“特授武功郎”，却以从七品诸司副使的身份，“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6]卷412《孟珙传》，12374。

为更清楚展现宋朝三衙管军的情况，现以三衙都指挥使为例，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宋史全文》等的相关记载，统计如表1。

朝代	殿前司都指挥使	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	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
宋太祖	王审琦、慕容延钊、张令铎、韩重赟、杨义、杨信	张光翰、韩重赟、石守信、韩令坤、刘光义、刘廷让、党进	石守信、安喜、赵彦徽、韩令坤、崔彦进、党进
宋太宗	杨信、刘廷翰、戴兴、王超	白进超、米信、李继隆、范廷召	李怀忠、戴兴、高琼、田重进
宋真宗	王超、范廷召、高琼、王汉忠、曹璨、蔚昭敏	葛霸(两任)、高琼、曹璨	刘谦、王隐、王能
宋仁宗	王守斌、夏守赟、李昭亮、许怀德、李璋	王守赟、杨崇勋、彭睿、夏守赟、王德用、高继勋、郝质	高化
宋神宗	郝质、燕达		
宋哲宗	燕达、姚麟		
宋徽宗	高俅	曹涌、种师中	高俅
宋钦宗		郭仲荀、曹曛	
宋高宗	杨惟忠、郭仲荀、刘光世、杨存中、赵密	郭仲荀	郭仲荀
宋孝宗	王友直、郭棣	赵搏、吴拱(马军行司)、吴挺(马军行司)	王友直、吴挺
宋光宗	郭杲		
宋宁宗	夏震		
宋理宗		吕文德	王坚
宋度宗	范文虎、陈奕	夏贵	
瀛国公	韩震		

表1 宋朝三衙都指挥使统计表

表1清晰地展示了北宋至南宋三衙管军由实职到虚衔,都指挥使人数不断下降的趋势,也是三衙管军的武阶官位下降的一个侧面。

宋朝文官王旦、司徒、吕夷简可以“各任宰相二十年”,但在重文抑武方针下,三衙管军人员却频繁更换。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十一月,党进被罢三衙管军,出为忠武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党进“掌禁卫凡十二年”之情况^[1]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415。根据统计,任殿前司军职者141人次,任侍卫马军司军职者为207人次,任侍卫步军司军职者为129人次,共计477人次,这只是对有明确任免时间的管军者的统计,若加上史籍没有记载者,则远远超过477人次^②。三衙军职中,任职时间最短者为仅一月,如元丰元年十二月,马军副都指挥使杨遂权殿前副都指挥使,二年正月,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容州观察使^[1]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丁卯,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壬午,7190,7197;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马忠为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六月为河北经制使,“措置节制民兵”^[10]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丑,140,174;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王元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四月,王元责英州安置^[10]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卷22,建炎三年四月甲寅,485,548。

当然,也有例外者,如高俅以蹴鞠取悦宋徽宗,“遍历三衙者二十年”^[11]卷7,1册184。他实际上根本不是军人,反而久其任,也根本不可能证明三衙管军武将地位的提高。

三、两司三衙管军的阙员

自宋太祖至真宗时,完成从五代两司到宋朝三衙的统兵体制转换,并逐步废除两司、三衙的最高军职。宋太祖废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司或三衙的管军剩下十二员。到宋真宗时,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与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各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共九员管军,名义上是以九员低品秩军职掌军。然而实际上,两司和三衙管军仍经常阙员,成为宋朝重文抑武的重要措施之一^[12]6-8。

乾德四年(966年)六月,外戚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权侍卫步军司公事

王继勋“为部曲所讼,付中书鞠之”,“制授彰国军两使留后,罢兵权”^[7]职官32之2,3813^[6]卷463《王继勋传》,13542。乾德五年(967年)时,“有谮”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者,上怒欲诛之”,赵普说:“陛下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者。”在赵普劝说下,二月,韩重赟“罢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1]卷8,乾德五年二月癸酉,190。从王继勋、韩重赟被罢“军权”之事可以看出,宋太祖对管军的猜忌和防范程度之深。从韩重赟被罢,殿前都指挥使一职空缺六年,直至开宝六年(973年)九月,宋太祖将静江节度使、殿前都虞候杨义除建武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1]卷14,开宝六年九月辛未,308。此后,两司、三衙管军省阙,便成惯例。

宋太宗为拉拢、优宠重要的文武官员,给他们丰厚的赏赐。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二月,宋太宗“赐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马军都虞候李汉琼、步军都虞候刘遇、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银各三百斤”^[1]卷18,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庚申,400。宋太宗对两司管军的赏赐名单中,只有殿前、马军都指挥使等五员,这应该是宋太祖开宝后期的两司管军配置的员数,表明两司管军大多是阙员。端拱二年(989年)十一月,宋太宗将刘廷翰以殿前都指挥使、武成节度使出为镇州都部署,说明刘廷翰此前并非为殿前都指挥使,而是宋太宗对“边防重寄,不宜轻授”的重视才除授^[1]卷30,端拱二年十一月辛丑,691。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特命”田重进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自张令铎罢马步军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1]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戌,620,至此重新任命,实际上成为侍卫司的最高军职。宋太宗后期,傅潜亦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6]卷279《傅潜传》,9473。地位更高的侍卫马步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就一直空缺。淳化时,则由李继隆出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1]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朔,767。

宋真宗时,王超自殿前都指挥使升迁侍卫马步军都虞候^[1]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辛酉,970-971^[6]卷278《王超传》,9465。按当时规定,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自王超罢职,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13]后集卷12,505。咸平四年

(1001年)七月时,“边臣言契丹谋入寇”,宋真宗命天平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副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为都排阵使,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为都钤辖,王超、王汉忠仍然分别兼镇州、高阳关都部署^[1]卷49,咸平四年七月己卯,1066。

景德二年(1005年)十二月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权步军司,会以疾在告”,宋廷命令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兼领二司”,高琼说:“臣事先朝时,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职位相亚,易于迁改,且使军伍熟其名望,边藩缓急亦可选用。”宋真宗“甚然之”,却也不会恢复“先朝”“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之状况^[1]卷61,景德二年十二月癸未,1377。天禧四年(1020年)十二月,宋真宗“以皇太子亲政行庆”,“赐殿前副都指挥使蔚昭敏钱四百万,步军都指挥使冯守信三百五十万,殿前都虞候夏守恩、马军都虞候刘美各三百万”^[1]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乙酉,2228。比宋太宗即位后赏赐的三衙管军员数又少一员,且只有步军司有都指挥使之职。

《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三衙管军“备则通治,阙则互摄”^[7]职官32之4,3814。“阙则互摄”是关键,已明文规定三衙管军不必全部置齐。从对宋朝的管军统计来看,北宋三衙管军多半只设都虞候^②。宋哲宗时,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说:“祖宗以来,三帅不曾阙两人”^[1]卷470,元祐七年二月丁卯,11225。表明大致从宋真宗时开始,至少的三名三衙管军亦可不满员。

南宋则出现一人身兼三衙事务者。如边顺,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时,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兼权马军司公事,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兼治殿前、马军司事务。刘錡,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并殿前、步军司公事,十一月,罢。解潜,绍兴八年时(1138年),“主管侍卫步军司兼权马军司公事”^[10]卷118,绍兴八年二月癸亥,2198。咸淳八年(1272年)十一月,南宋灭亡前夕,宋度宗以殿前都指挥使陈奕摄侍卫步军司、马军司^[6]卷46《度宗纪》,911。非常时期,以一人担任三衙军职,有利于军事行动,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王朝危亡之际,三衙军职也是阙员如此严重,可见其地位之低。

四、管勾(主管)三衙公事逐渐成为最高军职

宋太祖时,曾命外戚王继勋为权侍卫步军司公事,杜审琼为权点检侍卫步军司公事,利州观察使党进为权侍卫步军司事^[1]卷7,乾德四年五月庚寅,乾德四年九月丙辰,乾德四年九月丁巳,172,179;[6]卷260《党进传》,463《杜审琼传》,《王继勋传》,9018,13536,13542。使用“权”和“权点检”“公事”的名目,大致含有权且、临时之义,以此名目掌管三衙军权,为史无前例,却是宋朝另用比都虞候更低的、非正式的三衙差遣名目的开端。

宋真宗在位晚期的天禧三年(1019年),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泰州防御使夏守恩“迁殿前都虞候”,“仍权领殿前、步军司”,又“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1]卷93,天禧三年五月己未,第2145;[6]卷290《夏守恩传》,9716。在一个短时间内,竟以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的名目统管三衙。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杨崇勋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管勾马军都指挥使公事”,他是“以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的虚衔而任“管勾马军都指挥使公事”的实职^[14]卷3,2册456。另有“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建雄军节度观察留后、管勾步军都指挥使公事彭睿”^[14]卷3,2册457。庆历八年(1048年),“昨差出许怀德后,马步军皆阙都帅,遂自环庆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权勾当步军司公事”,其虚衔和实职相同^[15]卷24《论补军职》,5册523;[5]卷26《侍卫马军司》,1764。皇祐五年(1053年),“殿前都虞候、陇州防御使、权管勾步军司事王凯乞给大例请俸。诏以凯摄步帅,特从之”^[1]卷175,皇祐五年九月,4235。宋仁宗以殿前司军职中较低的都虞候“摄步帅”,而“摄”即“管勾”,不算正式长官。“管勾”与“勾当”意思相似,即以“他官来判者”^[2]219,至德元载(756年)十月辛巳朔,7002。南宋宁宗时,曾从龙上疏说:“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曾从龙虽然说的是州县摄官,但与三衙军职摄官道理相同,只是“暂时权摄”^[6]卷419《曾从龙传》,12547。

此后,如“管勾”“权管勾”“权勾当”“权领”三衙等名目的使用,不断扩大。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新郾延路副都总管燕遼权管勾步军司”^[7]职官32之5,3815;[1]卷282,熙宁十年五月戊午,卷315,元丰四年八月己巳,6903,7627。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诏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太原府路副都总管刘永年赴阙供职,(管勾)步军都指挥使、兼(管勾)马军司”^[1]卷315,元丰四年八月丁卯,7627。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权管勾步军司刘斌为秦凤路副都总管,权管勾马军司姚麟兼权管勾步军司”^[1]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10768,姚麟一人兼管侍卫两司。十二月,“郾延路副都总管、吕真为马军都虞候、权管勾步军司,秦凤路副都总管刘斌为步军都虞候”^[1]卷453,元祐五年十二月甲寅,10870。吕真乃是以马军都虞候的身份,兼任权管勾步军司,据后来的记载,姚麟则另升殿前都虞候。元祐七年(1092年)正月,边将刘舜卿“召还宿卫,卒于道”^[1]卷469,元祐七年正月己酉,11207。他已任命为步军副都指挥使,但尚未上任。二月,“以步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卒”^[1]卷470,元祐七年二月辛未,11225,宋廷遂任命“步军都虞候、信州团练使、定州路副都总管刘斌权同管勾马军司”^[5]卷26《侍卫马军司》,1765[16]卷9《赐权管勾马军司公事姚麟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22册239。

绍圣二年(1095年)六月,王崇拯权(侍卫马军司公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5。元符元年(1098年)，“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张整权管勾马军司事”^[1]卷494,元符元年二月甲申,11746。张整死后,“皇城使、威州刺史贾岳除正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权管勾马军司事”^[1]卷502,元符元年九月壬申,11966。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七日,宋徽宗“差枢密副都承旨曹诱权勾当马、步军司公事”^[7]职官32之6,3816。宣和年间,殿前都虞候、忠州团练使曹(曠)改权(管勾)侍卫马军司公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6。宣和末,有“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宁国军承宣使、管勾侍卫步军司公事何灌”^[17]卷26,193。靖康时,外戚王宗濬初任权管(勾)殿前司公事,另有“武昌军承宣使、权管(勾)侍卫步军司公事闻劼”^[18]卷1《赐权管(勾)殿前司公事王宗濬辞免殿前都虞候恩命不允诏》,《赐武昌军承宣使权管(勾)侍卫步军司公事闻劼乞官观不允诏》,1129册185,186。

总的说来,北宋的管勾、勾当三衙公事等,仍只占三衙管军的小部分,而且差遣名目尚未固定。南宋时避宋高宗讳,将“管勾”改称“主管”。在南宋人李焘所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史籍中,其记载北宋也或作“主管”,如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时,即出现“主管步军都指挥使”“主管马军司”^[1]卷315,元丰四年八月丁卯,7627。笔者和王曾瑜先生讨论此事,他认为此乃李焘和南宋史官避宋高宗讳,而将原有的“管勾”改为“主管”,但记录北宋者又存在“勾当”“管勾”公事之差遣,实源于李焘和南宋史官史笔混乱所致。

在北宋末军队溃散之余,南宋建炎时以御营使司等重组军队,原来的三衙管军之权基本取消。在绍兴年间对金和议前后,三衙军权又有所提高,但不再统管全军军队,只统管三支屯驻大兵,三衙管军的地位大致与沿江和川陕都统制司相当。从建炎时始,主管三衙公事便正式成为管军的正常差遣,并成为南宋主流的差遣名目。

建炎时,如王元任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任权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惟忠任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左言、李质、刘锡、赵哲和边顺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闻劼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5]卷26《侍卫马军司》,1766;[10]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241;卷12,建炎二年正月甲辰,315;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485;卷22,建炎三年四月甲寅,548;卷24,建炎三年六月辛酉,577;卷31,建炎四年正月庚戌,707;卷33,建炎四年五月甲寅,762;[17]卷117,132;卷138,855,962,1008。当时已将三衙管军降为“主管”“权主管”和“权同主管”三等。宋时官衔中的“同”含有副职之义,如统制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和“同副统制”,“同”的地位又高于“副”字^[6]卷167《职官志》,3981;[10]卷53,绍兴二年闰四月己未,1105。

作为原三衙管军之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或作虚衔。自绍兴十年(1140年)始,川陕大将吴玠、杨政和郭浩都先后兼“侍卫步军都虞候”^[17]卷202,1457;[10]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甲申,2741;卷149,绍兴十三年五月乙丑,2812;卷154,绍兴十五年十一月丙辰,2918;[19]卷11,卷12,1129册,116,123,128。鄂州大军都统制王贵因岳飞冤狱退闲,“除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添差福建路副都总管”^[17]卷208,1599;[10]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丁未,2718;[19]卷14,1129册,147。

南宋也有个别武官长期担任三衙军职。杨存中(杨沂中)自绍兴三年(1133年)时就兼权殿前司公事,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为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他的官衔是殿前都虞候、主管侍卫步军,兼权马军司公事。杨存中自己也清楚“祖宗置三

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独总，非故事也”，自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月，兼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才罢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之差遣，“存中领殿(巖)^③几三十年”^④ [10]卷68，绍兴三年九月乙亥，1341；卷91，绍兴五年七月乙未，1762；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丙午，2012；卷118，绍兴八年二月癸亥，2198；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壬辰，2365；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寅，3652；[6]卷367《杨存中传》，11436；[7]职官32之11，3818。杨存中号称张俊之“大男”；[10]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丙午，2780，2783，宋高宗宠信张俊之“大男”，有多种因素，包括牵制和防备秦桧，故能长期担任三衙军职。杨存中虽“领殿(巖)几三十年”，但最初是以殿前都虞候之虚衔主管殿前司公事，绍兴九年(1139年)，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之虚衔“主管都指挥使公事”。即便罢军职前，也是以“三少”之一的少师的身份，“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之特殊高位差遣。由此可见，殿前都指挥使之类军职，何种场合为实职，何种场合为虚衔，有相当大的弹性。

依现存史料，终南宋一代，使用前述“权主管”公事和“权同主管”公事的情况相当少见，主要还是以“主管”公事，作为三衙管军的名目。这当然是三衙管军地位下降的明显标志。

五、文尊武卑的三衙管军礼仪

五代是武夫横行之世，文官们只能低眉拱手，听任他们摆布。宋朝为确立文官政治，制订了文尊武卑的礼仪制度。北宋三衙管军虽为武将之尊，然而据《文献通考》卷58引“沈氏《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20]1739按今《梦溪笔谈》已脱此条。沈括未说此礼始于何时，估计大约是宋真宗确立三衙制之后。

可以互相印证者，南宋初的汪藻追述说：“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以今观之，一何陵夷之甚耶？”^[2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1128册，8；[22]卷18《与赵端明》，85册，40；[24]卷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10册，36胡寅也说，“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于帘外倒杖声喏而过”。宋仁宗朝的“吕

夷简为相日，有管军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分守之严如此。今见其分庭抗礼矣”^[25]卷86，1183。

北宋在宰执大臣和三衙武官之间，确立严格的尊卑名分，以文制武，使三衙武官唯有俯首听命，这当然也是三衙管军地位下降的重要措施和标志。然而依汪藻和胡寅之说，南宋初年，此类礼仪已无疾而终。这固然显示当时武将地位有所提高，但无论如何，宋朝官场文尊武卑已成定局，此后三衙管军的地位仍比北宋更低。

自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猜忌武将，成了天水一朝历代皇帝永久性的提心吊胆的梦魇，讳疾忌医心病。文臣们也绞尽脑汁，提出各种压制、监控武将的措施、方案、政策、制度等。如军区的文臣统兵，自然是皇帝与文臣们的共同设计；而宦官统兵，更是皇帝的乾纲独运，宠臣辈的迎合。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军制“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的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12]521。也就是说，作为宋朝军制中的三衙管军地位的变化，都体现了上述特点，也正是“因循苟且”“守内虚外”“保守的文官政治”的具体化。

此种基本国策下，将才的凋零，就具有必然性。三百余年间，宋朝武运衰颓，武功不振，将才寥落，当然是宁愿牺牲军事效能，也必须压制、猜忌，以至摧残、杀害良将的必然恶果。赵宋皇朝管理军事和对待武将的一整套家法，即某些文臣所称道的“祖宗之法”，至愚极陋，却又沾沾自喜，实为中华历朝所仅有^④。

注释

①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3页。已故的范学辉先生在《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对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的产生与演变,三衙管军的地位与任职资格、选任及其素质状况等进行了研究,甚下功夫。②参见史冷歌《宋朝武官制度研究》(书稿)第10章附表1《宋朝三衙管军任职时间、官衔统计表》。③“殿(巖)”,原作“殿严”,“巖”与“严”或可通用,据《宋史》卷367《杨存中传》,第11438页改用正字。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

典》(增补本)2017年版第439页已说,宋时殿前司的别
名有“殿巖”,“巖”大约是形容殿前司地位高峻之义④
本部分参考《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第十四章第
一节。

参考文献

-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史长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M].保定:河
北大学出版社,2013.
[4]程大昌.演繁录[M]//全宋笔记第4编.郑州:大象出
版社,2008.
[5]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
书局,2006.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8]孙逢吉.职官分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周必大.周益公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
书局,2004.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13.
[11]王明清.挥麈后录[M]//全宋笔记第6编.郑州:大象
出版社,2013.
[12]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
局,2011.
[13]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M].扬州:广陵书社,2008.
[14]夏竦.文庄集[M]//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
2004.
[15]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北京:
线装书局,2004.
[16]苏轼.东坡七集·东坡内制集[M]//宋集珍本丛刊.
北京:线装书局,2004.
[1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
[18]翟汝文.忠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
北:商务印书馆,1986.
[19]张扩.东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20]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1]汪藻.浮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22]方岳.秋崖先生小稿[M]//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
装书局,2004.
[23]叶梦得.石林燕语[M]//全宋笔记第2编.郑州:大象
出版社,2006.
[24]周密.齐东野语[M]//全宋笔记第7编.郑州:大象出
版社,2016.
[25]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9.

From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the Top Military Official Posts of Sanya (三衙) to Explored Valued Civil Officials and Despised Military Commanders of Song Dynasty

Shi Lingge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ng Taizu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Constantly devalu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Subsequent emperors also inherited thes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policies, Top military commanders were in declining political status: From Song Taizu to Zhenzong, The top military official posts of liang si (两司)、Sanya were gradually abolished and gradually became void titles; their official rank were gradually reduced, dropped from khrom to prefectural governor, the people in these positions had been replaced frequently; the charge of Sanya's official business gradually became the highest military pos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became a normal dispatch; In Song Dynasty officialdom, civil official were superior to military officer, These we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the top military official posts of Sanya.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top military official posts of Sanya; declined in status; Valued Civil Officials and Despised Military Commanders

[责任编辑/云 扬]